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12
108(第 11 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农村"宗教热"原因探究:宗教社会风险假说

阮荣平[1], 刘璐琳[2]

(1.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2.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基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宗教风险假说,认为风险以及风险应对能力是人们做出宗教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贫困和弱势群体等角度,根据作者调查数据、国家统计数据以及其他全国和局部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市场经济中的宗教需求要高于计划经济;(2)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教密度就越高;(3)弱势群体的宗教需求要高于强势群体。这些结果证明了宗教风险假说的合理性。最后依据该假说,提出针对当前农村"宗教热"政策建议主要有两点:(1)降低农村人口所面临的风险;(2)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 农村; 宗教热; 风险; 理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202(2012)01 - 0108 - 09

一、引言

到目前为止,对于我国宗教信仰人数的具体数字尚缺乏统一的认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信仰人数的发展速度和绝对数量都是惊人的。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1949 到 1982 年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7 万人,每年以近 10% 的速度增长。1982—1987 年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达到了 20 万人,每年以 7% 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在 1987—1996 年,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则达了 67 万人,每年以 17% 的速度增长。另外,根据一些学者所作的局部调查,我国宗教信仰人数的增长速度也是颇为惊人的,如根据王申红的调查,1982—2004 年,皖西北地区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1]。根据黄剑波的对吴庄调查,1949—1980 年,该村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而 1980—1998 年间,该村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猛增为 13%[2]。另外,从绝对数量来看,我国信教人数也是极其庞大。关于我国信教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的分歧,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 1 亿①,而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组所公布的数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其调查结果显示,在年龄为 16 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 31.4%。按照人口比例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 3 亿。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微观调查,我国农村信教比重更是高得惊人。李红菊等对河南省新乡市张巨乡蒋村的调

收稿日期: 2011 - 10 - 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8&ZD0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3132);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201104022);中国博士后研究基金项目(20100480135)

作者简介: 阮荣平(1983—),男,河南开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农村文化.

① 很多学者对这数字表示质疑,认为其不能反映我国宗教的真实情况。于建嵘指出,现在政府公布的基督教徒的人数与现实的信教人数有较大的差距,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太陈旧,已经不准确了。目前基督教的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地方政府不敢如实上报;(2)有的地方宗教局登记时要收钱,信徒不愿交钱;(3)还有些信徒认为信仰是属神的事情,不是俗世的事情,因此不愿到政府机构登记。所以最终会导致官方统计数据失实[3]。刘志军对山西一个教会的访谈中,一基督教教父就坦言,他们在上报教众数量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折扣 50 - 70%[4]。

查显示该村信教比高达 80%[5]。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宗教热”正在悄然进行。我国官方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信奉的是无神论，而宗教最为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有神论，在这一方面，二者可以说格格不入。因此宗教热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酝酿着一场精神领域的转型。这场精神领域中的转型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对其影响的方向尚无定论，其影响已经初现端倪。如赵琼指出，宗教的迅速发展，直接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6]。林盛根等也指出，近年来，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发展较快，并对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产生影响[7]。席升阳等也认为河南农村宗教活动会对基层政权产生影响[8]。汪恩乐则认为，基督宗教信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作用[9]。

姑且不论转型的具体影响如何，转型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一精神转型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宗教热”本身已经吸引了诸多学者的重视，也有不少学者在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系统的范式，这些研究所观察到的原因往往零散而不够深入。本文则试图借鉴宗教理性选择学说，从宗教功能主义的角度，引入风险的概念来解释我国农村“宗教热”现象。认为正是由于为了应对自身无法化解的风险，人们才选择了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所以精神空虚、看病就医等现象只是当前农村“宗教热”的浅层次原因，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应对其自身无法化解的风险。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虽然更具活力，但是由于其更为强调经济自由化以及决策个体化，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所面临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面临的风险。但在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却没有跟上，所以最终使得人们被无情地赤裸裸地暴露在诸多风险之下。“人穷呼天”，此时人们化解风险或者化解风险给其带来的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救助于超自然力量，因此宗教需求增加，在宗教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就是“宗教热”。

二、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农村宗教热原因的探究，已经有不少文献做出了努力。研究的视角大体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的视角是从全国层面来论述我国宗教的发展。如姚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的迅猛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将其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共和国成立后的 30 年间，基督督教经历了革新、联合、沉寂的曲折演进历程。外因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价值观念变迁、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泛滥等社会问题和基督教自身的特点[10]。艾虹也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宗教信仰兴盛原因，认为新时期政治方面的理想信念危机，心理方面的失落感、孤独感，基层组织方面的弱化、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宗教教义界限的混淆，发展经济方面的一些地区政府“借神敛财”，文化方面的精神生活多样化是我国近年来宗教兴盛的主要原因[11]。何兰萍、陈通则认为，当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客观上为农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基层正式组织的弱化则使得很多农民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和满足精神需求。在此背景下，宗教组织作为非正式组织的一种吸引了不少教众[12]。晁国庆认为，当前农村宗教盛行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失范造成的[13]。黄旭涛认为，当代宗教的世俗性取代了神秘性，它的功效也从追求缥缈的彼岸世界以得到安慰，转变为现实地给人以心灵的宁静和抚慰，更迎合了当代民众的心理，成为当代人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和寻求安宁平静的心灵的皈依地，这是当代宗教热产生的主要原因[14]。

中观的角度是从社区或者地区的层面来分析我国宗教的发展。王申红对皖西北农村的“基督教热”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社

会转型时期农民群体由于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迷惘而导致的精神状态的失衡”,“基督教本身独特的传教方式适应了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习惯并且能够弥补其文化生活空白”是皖西北农村出现“基督教热”的主要原因[1]。吕朝阳分析了苏北农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基督教迅速地发展的原因,指出其原因包括:“基督教在此地区有历史基础”,“政策的开放和民众观念的开放”,“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基督教在农村有其发展的心理土壤”[15]。程俊飞等以晋南A村为例研究了基督教在晋南农村盛行的原因,他们指出,宽松的外部环境为村民信仰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患病求神保佑而信教;精神文化需求因素是村民信仰宗教的另一原因;就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本身而论,在伦理层面的共通是其在中国农村地区盛行的一个因素;基督教传入我国后,不断吸收儒家思想,出现了“本土化”的特征,为其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心理环境;基督教具有的社会正功能也是其广为传播的一个因素[16]。席升阳等认为河南省农村宗教活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宽松的政治环境、人的精神需求、社会矛盾冲突和宗教自身的功能和特点等[8]。闭伟宁指出基督教在斜桥镇传播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寻求精神寄托,家庭成员之间的宗教影响,疾病,宗教组织及其活动的中国化、自治化,正视现世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人们观念的更新,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被迷信化[17]。

微观的角度是从个体或者家庭层面来研究个体信教的原因。陈占江通过皖北某村庄的农民信教行为的田野调查,认为农村基督教的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基督教传播策略的成功。他指出,基督教的传播策略已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与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心理结构进行着深层互动,而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得到迅猛的发展[18]。杜景珍指出,农民入教的主要动机是靠主求平安,在其受访的23人中,谋求上帝保佑合家健康而入教的有18人,占75%[19]。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我国农村宗教热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了我们对农村宗教热原因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最大不足是缺乏一定范式和理论分析,因此其对农村宗教热原因的探究大都较为零散且较为浅显。

三、我国农村宗教热的理论分析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Iannaccone指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是科学研究宗教的一种十分有力的范式[20]。目前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已经产生了许多实证发现和指导未来研究方向的假说。按照这一范式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诸多模型来对宗教进行经济分析,如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宗教俱乐部模型,宗教厂商模型等[20]。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宗教的信奉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信奉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回报。同时对于神灵的信奉又必须付出时间、精力等成本。人们通过比较信奉神灵与不信奉神灵之间的成本收益,来做出是否信奉神灵的决定。宗教的委身程度取决于信教的成本收益比。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进一步推理,人们在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风险时,总会选择对神灵的信奉。因为由于这种风险是自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无论其投入多少时间、精力、金钱,其最终仍然无法解决其所面对的风险,投入最终的收益也只能为零;而神灵是无所不能的,通过对神灵的选择,其总是能找到化解该风险的神灵,这样,其收益肯定要大于不信奉神灵的收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选择对神灵的信奉。因此,风险以及风险应对能力是宗教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所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在计划经济中所面临的风险。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始终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本身则意味着经济环境的风险。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销售、分配等经济活动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指令,进行统一计划和管理,经济活动具有简单、明晰、可预见性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是独立的自主性的,生产和销售完全依赖于市场,生产经营者要独立地对自己的经济活

动进行预测和决断。由于商品交换过程复杂，在经济运行中，孤立的个人所汇合而成的经济过程使个人无法控制；反而这一过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个人。市场经济复杂、模糊和不可预见性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无法预料[21]。因此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要远远大于计划经济。

而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相对滞后的。在风险增加而应对风险的手段却没有强化的情况下，人们更可能会选择对神灵的信奉，对宗教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在宗教研究中，很多学者将宗教做为一种社会服务的供给者[22]。Chen and Lind，Chen 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来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认为宗教的这种社会保险功能是宗教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3-24]。Gruber 和 Hungerman 研究了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对教堂慈善支出的挤出程度，发现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得教堂支出减少了 30%[22]。公共财政支出与宗教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较高政府支出会导致较低的教堂慈善活动。Chen 对经济贫困与宗教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发现，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期间，每月人均非实物支出下降 1 美元的家庭参加社区可兰经学习的概率就会增加 2%，将孩子转到伊斯兰学校的概率也会增加 1%。另外，他还发现信贷的可获得性降低了经济危机与宗教强度之间的关系，其程度达 80%。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宗教强度降低了人们对救济的需求和对生活必需品的信贷需求。宗教组织的存在减少了村民之间消费需求波动的扩散[24]。这些经验证据表明降低风险很可能会减少宗教需求。

由宗教风险假说可以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H1. 市场经济中的宗教需求高于计划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所面临的风险要高于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又没有跟上，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更可能会选择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从而更可能会选择信教。

H2. 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教密度就越高。

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在应对风险能力和宗教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该地区的宗教热情就会越高。

H3. 弱势群体的宗教需求要高于强势群体。

与经济上贫困的群体一样，弱势群体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应对风险能力的低下，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更会选择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同时在宗教供给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更会选择信教。

四、经验证据

下面我们将通过经验数据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宗教信仰比较

按照 H1，改革开放以后，信教人数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都应该有大幅度提高。图 1 初步印证了这一假设。从图 1 可以清晰地看出，1949 年我国基督教徒仅有 70 万，1949—1982 年的基督教徒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而到了 1996 年我国基督教徒的数量则猛增为 1000 万，1982—1996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3%。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徒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1996 到 1999 年，这一高增长速度得到了维持，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为 1500 万。

另外，从图 1 中还可以看出，即使刨去总人口增长的趋势，基督教徒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在不断增加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宗教增长率高于改革开放之前。1949 年我国基督教徒所占比重为 0.14%，到了 1982 该比重则为 0.30%，1996 年则为 0.83%，1999 年则达到了 1.19%。1949—1982 基督教徒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为 3.46%，而到 1982—1996 该增长率则达到了 12.70%，到了

1996—1999 年该增长势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增长率达到了 14.29%。由此可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风险加剧,使得我国信教人数开始猛速发展。

尽管我国官方的宗教数据受到了各方的质疑,但是如果在各时期其所统计信教人数的缩水率是一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用该数据对信教人数的增长率进行刻画。

按照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①]数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信教比重的年均增长率更高。1990 年我国信教比重 4.70%,而到了 2000 年我国信教比重则达到了 13.70%,1990 年到 2000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9.15%。远远高于按照我国官方数据所计算出的年均增长率。十分遗憾的是,该调查仅始于 1990 年,从而无法对比改革前后我国信教人数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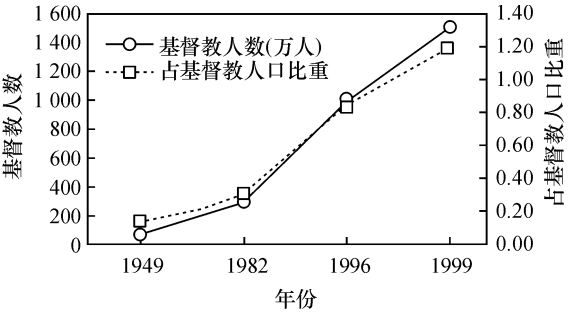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基督教信仰人数的历年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1949—1982 年数据来自《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 号;1996—1999 年数据来自《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总结》. 天风 2000(10)。

然而,改革开放后信教人数总量和增长速度高于改革开放前,其原因既有可能是因为经济体制不同而带来的经济风险的不同,同时也可能因为文革期间的宗教信仰破坏造成了宗教供给的减少,进而使得信教人数减少。在宗教供给与风险之间,谁才是造成改革前后信教人数总量和增长速度不同的根本原因呢? 从下面的一组数据中,可以发现相对于宗教供给而言,风险更能解释改革前后信教人数总量和增长速度的不同。

河南省在 1949 年信教人数为 12 万人,文革前的信教人数为 7.8 万,1994 年的信教人数为 120 万人。由此可以看出,1949 年到文革前,尽管此时还没有实行宗教迫害,但是此时信教人数仍然是下降的,而在市场改革之后,信教人数则迅猛增加。由此可知,经济风险相对于宗教供给更能解释改革前后信教人数总量和增长速度的不同。赵宪对建阳县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建阳县的基督教徒没有并没有增加,相反而是有所减少。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徒的数量则开始迅猛增加。参见图 2。

将分析的时间段延长,我们还可以找出风险与信教之间关系的另一种例证。图 3 给出的鄞县解放前后信教人数的对比情况。在解放之前,我国社会一直面临着诸多矛盾,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不断出现,因此在此情况下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高于解放之后。根据宗教风险假说,解放之前人们信教的概率要高于解放之后。图 3 显示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由图 3 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解放之前信教人数一直呈增加的趋势,而到了解放之后,则表现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

---

① "世界价值观调查"起源于 1981 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onald Inglehart 所发起,至今已完成每五年一次总共 5 次的全球性调查。此调查涵盖的母体已经达到全球人口的 85%。五波调查资料提供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可探讨的议题非常广泛,至今超过 400 篇且运用 20 多种语言的论文或专书于国际知名的研讨会、期刊或出版社发表。该调查在中国所使用的问卷语言是中文,其调查对象是 18 岁以上的成人,18 岁以及 18 岁以下的并不在调查对象之列。目前该调查有关中国信仰方面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三次,分别是 1990 年、2000 年和 2005 年。该调查的样本是通过多层随机抽样获得的,首先将各省根据其经济情况分为三类,然后在每一类抽取一定的样本。然后在每一个省内,随机选择 20 个样本点,每个样本点选择 5 个人作为调查对象。个体的抽样是按照城乡、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进行的。最后的样本选择是男性占 60% 和女性占 40%,以及城市占 70% 和农村占 30%。最后的样本规模是 10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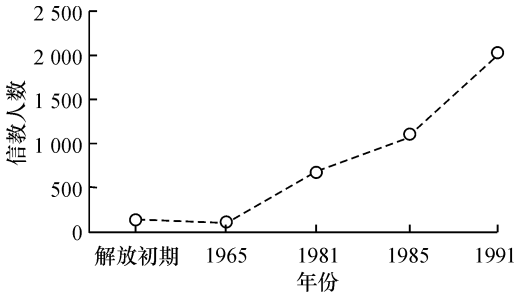


图 2　建阳县基督教教徒发展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赵宪.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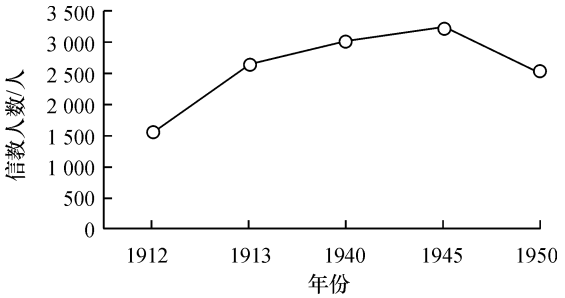


图 3　鄞县天主教徒人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鄞县宗教志》。

总之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信教人数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都要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前。这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选择信教的概率要高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选择信教的概率。

(二)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教密度就越高

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风险要高于市场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以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教密度就应该高于市场经济欠发达地区。

根据 world value survey 的调查结果，我国信教比重最高的三个省份有两个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要远远高于信教比重最低的三个省份。

现有关于信教密度的地区实证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大都支持了该研究假设。东南沿海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也是我国信教密度较大的地区。如作为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温州则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26]，其基督教密度是全中国最高的地区[27]①。温州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有相当一部的私营老板也是基督徒，被称之为“老板基督徒”[27-28]。私营老板是市场经济最为主要的主体之一，并且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承担着比常人更为严峻的经济风险，所以这一部分人信教在一定程度也恰恰说明了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宗教的繁荣。

甘满堂对全国 10 个省市②的信教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福建省相对于其他省市的信教密度也是较高的。其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民众认为自己是宗教徒比率为 29.2%，是全国值 8.7% 的 3.4 倍；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的只有 11.0%，而全国比率为 26.1%。从宗教场所来看，高达 92.3% 的调查对象回答居住社区有宗教活动场所，而全国值为 34.8%[30]。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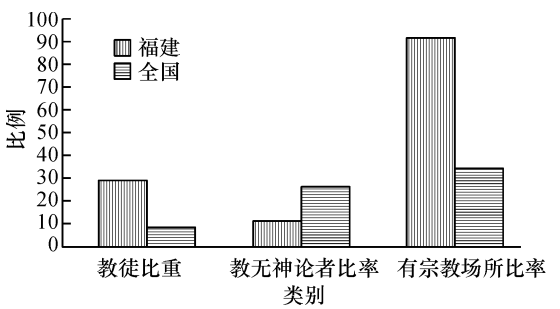


图 4　福建省信教状况与全国信教状况对比

资料来源：甘满堂. 世界宗教研究，2007 年第 4 期[30]。

① 根据 Mo 的估计，在 1988 年温州至少有 12%(约 600000)的人口信奉基督教，按照这个比例，随着温州总体人口的增长，其基督教众人数到 1998 年也有 700000 人之多[26]。而根据一些教堂的领导人员的估计，温州基督教人数已经有 1000000 人之多。根据 Chen 和 Huang 的估计，温州拥有教堂 1200 个[29]。

② 这 10 个省市分别是北京、辽宁、山东、福建、江苏、湖南、河南、湖北、重庆、陕西等。由此可见，其调查范围中东南沿海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其他非东南地区较多。

(三)弱势群体更有可能会选择信教

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往往是比较低的,因此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更有可能会选择信教。一般而言,目前农村的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妇女、老人以及低收入者。

利用作者于2008年11月在河南省嵩县的调查数据①,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对该假设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参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信教的比重更高,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这一结果不随是否使用rubost标准差而改变。另外,年龄与信教也成正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信教的概率就增加。这也就是说年老者更容易信教。我们的回归结果没有发现收入与信教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是收入对信教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高收入的风险保障作用会降低个体信教的概率,但是同时高收入者往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这又会提高其信教的概率,因此收入与是否信教之间具有更加复杂的关系。

表1 弱势特征与是否信教之间的回归结果(probit回归) **单位:亿元**

	(1)		(2)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女性	1.408209***	0.360544	1.408209***	0.366541
年龄	0.034741***	0.015333	0.034741****	0.014499
收入	0.000072	0.000051	0.000072	0.000054
收入的平方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常数项	-4.443436***	0.907726	-4.443436***	0.914009
是否是rubost标准差	是		否	
Number of obs	286		286	
Log likelihood	-107.79674		-107.79674	
Prob > chi^2	0.0007		0.0001	
Pseudo R^2	0.0966		0.0966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调查。因变量为是否信教。***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与其它现有对于农村信教的调查研究也相似。南昌高专课题组、王健、杜景珍、以及闭伟宁的调查等结果都表明在农村教徒中,有明显的女性化、老龄化等特征[31-32]。如南昌高专课题组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基督教信徒,女性所占的比重都要远远高于男性所占的比重。在佛教信徒中,女性所占的比重是男性比重的7倍,在基督教信徒中,女性所占的比重是5倍。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基督信徒,随着年龄的增加其信教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这两个宗教的信徒中,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佛教信徒中,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8.8%,基督教信徒中,老年人的比重达到了53.2%[31]。

① 该数据是郑风田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文化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在河南省嵩县收集到的农户样本数据。课题组对嵩县进行了试调查和正式调查,前后近20天,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有三类:村级问卷、农户问卷和教会问卷。调查过程中,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根据各乡镇的经济状况、距离县城的远近,由课题组与嵩县相关负责人从全县16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了6乡镇。然后根据各乡镇村名单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了6-8个样本村,最后根据样本村的农户名单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了6-10户样本户。这样,共得到40个村级样本和340个农户样本。有效回收的村级问卷份数和农户样本数分别是40村和340户。

5　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基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本文认为人们所面的风险以及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是决定农村人口是否信教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由于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人们面临的风险要更大，所以在社会保障体制没有跟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宗教热情会越高。另外由于弱势群体应对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因此贫困地区以及弱势群体信教的概率就比较大。利用各方面的数据，包括作者自己调查的数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及其他已经公布的全国层面或者地区层面的调查数据，本文对上述研究假设一一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市场经济中的宗教需求高于计划经济；(2)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教密度就越高；(3)弱势群体的宗教需求要高于强势群体。这些结果印证了宗教风险假说。

针对宗教风险假说的政策建议是，目前“宗教热”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农户所面临风险的剧烈以及其应对风险的薄弱。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包括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信贷机制等也都应加快建设的步伐。同时也要注重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农村的治安秩序等方面建设，努力使农民所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王申红. 基督教信仰与农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以皖西北农村为个案研究[J].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3).

[2] 黄剑波. “四人堂”纪事—中国乡村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3.

[3] 于建嵘. 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J]. 领导者，2008，(2).

[4] 刘志军. 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M]. 合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李红菊，崔金霞，张　蓉，等. 乡民社会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探析——对豫北蒋村教堂的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 赵　琼，当代中国宗教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及对策[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7] 林盛根，张诺夫. 宗教和民间信仰对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2).

[8] 席升阳，马　凌，宋清华，等. 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1).

[9] 汪恩乐. 论基督宗教信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J]. 金陵神学志，2008，(2).

[10] 姚　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3).

[11] 艾　虹. 近年来我国宗教信仰兴盛原因的探析[J].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12] 何兰萍，陈　通. 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J]. 理论与改革，2005，(2).

[13] 晁国庆. 当前农村宗教盛行的原因[J]. 广西社会科学，2005，(5).

[14] 黄旭涛. 当代中国宗教热现象探微[J]. 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15] 吕朝阳. 苏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其原因分析[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

[16] 程俊飞，刘宪俊. 基督教在晋南农村盛行的实证研究——以晋南 A 村为例[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7] 闭伟宁. 改革开放与基督教在我国沿海农村的变迁——基督教在斜侨镇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18] 陈占江. “基督下乡”的实践逻辑——基于皖北 C 村的田野调查[J]. 重庆社会科学，2007，(9).

[19] 杜景珍. 当代农村基督教信仰调查[J]. 中国宗教，2004，(1).

[20] IANNACCONE L R.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36(3).

[21] 刘忠卫. 目前我国农村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J]. 青海社会科学,1997,(1).
[22] GRUBER J, HUNGERMAN M. Faith-based charity and crowd-ou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
[23] CHEN L, LIND J. Religion, welfare politics, and church-state separation[J],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2007,42(1).
[24] CHEN L.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118(4).
[25] 赵 宪. 对农村"基督教热"的思考[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4,(1).
[26] MO F. A History of Wenzhou Christianity[M].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Press,1998.
[27] CAO N. Christi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st-mao state: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 Sociology of Religion, 2007,68(1).
[28] CAO N. Boss christians: the business of religion in the "wenzhou model" of christian revival[J]. China Journal, 2008,(59).
[29] CHEN C, HUANG T.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hristians in china today[J],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2004,46(2).
[30] 甘满堂. 闽侯县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体验—兼与全国汉族地区调查数据比较[J]. 世界宗教研究, 2007,(4).
[31] 南昌高专课题组. 南昌市宗教信仰现状调查[J]. 南昌高专学报,2003,(2):.
[32] 王 健. N地区农村宗教信仰调查[J]. 宗教学研究,1989,(Z2).

Reasons of "Rural Religion Fever": Religion Social Risk Hypothesis

RUAN Rong-ping[1], LIU Lu-lin[2]
(1.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ligi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religion social risk hypothesis, that risk and capacity to overcome ris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religion choice. We examine the hypothesis from prospects of marketing system, poverty, and weak group using data from field work by ourselves, statistic data from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 data from field work by other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ligiosity of people in marketing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at in planning system; (2) the religiosity of people in regions of developed marketing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at in religions of developing marketing system; (3) the religiosity of weak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trong group. Those results prove the religion social risk hypothesis. Frnac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eaning of rural religion fever, which is to reduce the risk faced to by peasants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them to overcome the risk.

Key Words: Rural Area; Religion Fever; Risk; Rational Choice